

李商隐传论

刘学锴 著

增订本 下册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隐传论

刘学锴 著

增订本 下册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目 次

下编

第一章	晚唐前期的政坛与诗坛	411
第一节	文武宣三朝政坛	411
第二节	晚唐前期诗坛的三大诗人群体	417
第三节	李商隐在晚唐前期诗坛上的地位	422
第二章	李商隐的思想与悲剧性格	426
第一节	李商隐的思想	426
第二节	李商隐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心态	438
第三章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448
第一节	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概述	448
第二节	牛李党争的性质问题	454
第三节	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倾向性	460
第四节	李商隐在与牛李两党的关系上暴露出来的人品缺陷	473
第四章	李商隐创作的分期	479
第一节	于学习模仿中初露风格个性的时期	481

第二节	由关注现实政治向着重抒写个人身世和人生感慨转变的时期	486
第三节	感伤诗风的成熟期	491
第五章	李商隐的政治诗	497
第一节	广泛性	499
第二节	深刻性	500
第三节	整体性	504
第四节	独特性	507
第六章	李商隐的咏史诗	510
第一节	李商隐以前咏史诗的发展	510
第二节	李商隐咏史诗的讽时性	513
第三节	李商隐咏史诗的典型性	516
第四节	李商隐咏史诗的抒情性	520
第七章	李商隐的咏物诗	524
第一节	李商隐以前咏物诗的发展	524
第二节	从类型化向个性化的转变	526
第三节	李商隐托物寓怀诗的艺术特征	532
第八章	李商隐的无题诗	538
第一节	无题诗界说	538
第二节	李商隐无题诗寄托问题辨析	541
第三节	李商隐无题诗的特征	549
第九章	李商隐的爱情诗	557
第一节	一般爱情诗	559
第二节	李商隐的忆内诗和悼亡诗	570
第十章	李商隐的女冠诗	580
第一节	湘瑟秦箫自有情	580
第二节	境类心通	586

第十一章	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	594
第一节	李商隐以前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	594
第二节	李商隐诗中的命运感慨与世情感慨	598
第三节	李商隐诗中的情绪型感慨	601
第十二章	李商隐的七言律诗	608
第一节	对七律内容的开拓	609
第二节	对七律艺术的创新	613
第三节	李商隐七律的两种类型——典丽精工 与清空流美	619
第十三章	李商隐的七言绝句	625
第一节	运重入轻	626
第二节	化重为轻	628
第三节	推进一层	633
第十四章	李商隐的其他各体诗歌	637
第一节	李商隐的五言古诗	637
第二节	李商隐的七言古诗	640
第三节	李商隐的五言律诗	646
第四节	李商隐的五言绝句	649
第五节	李商隐的五言排律	652
第十五章	白描胜境话玉谿	656
第一节	历代对李商隐诗的主导看法	656
第二节	义山诗自有白描佳境	660
第三节	以白描为主要特征的诗在义山创作中的 意义及不被重视的原因	671

第十六章 李商隐的骈文	675
第一节 李商隐骈文概述	675
第二节 表	678
第三节 状	680
第四节 启	685
第五节 牒	687
第六节 祝文	689
第七节 祭文	690
第八节 箴铭书序及黄篆斋文	697
第十七章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703
第一节 樊南文中的诗语	704
第二节 樊南文中的诗情	707
第三节 樊南文中的诗境	711
第四节 樊南文的诗心	714
第十八章 李商隐的赋和古文	717
第一节 李商隐的赋	717
第二节 李商隐的古文	721
第十九章 李商隐与宋玉	733
第一节 李商隐与宋玉身世境遇、思想性格的相似点	734
第二节 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主题和悲秋伤春的意蕴	736
第三节 微辞托讽	738
第四节 抒写艳情绮思	740
第五节 李商隐与宋玉的异同	741
第六节 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	743
第二十章 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	747
第一节 中晚唐绮艳诗风与诗的词化	748

第二节 李商隐诗的词化特征	751
第三节 李商隐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 ...	756

附编

第一章 历代李商隐研究述略	767
第一节 从唐末至明末的李商隐研究概述 ...	768
第二节 清代的李商隐研究	770
第二章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李商隐研究述略	782
第一节 传统笺注考证成果的总结	782
第二节 在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李商隐研究的新变化	787
第三节 总结与创新并重的新中国成立后李商隐研究	791
第三章 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	800
第一节 《李商隐诗集》三卷本系统	801
第二节 《李义山集》三卷本系统	803
第三节 季沧苇抄本、朱鹤龄注本及《全唐诗》的三卷本系统	805
第四节 明代分体刊本系统	807
第四章 分歧与融通	810
第一节 创作起始阶段的触绪多端百感交集	810
第二节 创作过程中于特定题材的歌咏中融入多方面生活感受	813
第三节 创作完成后接受主体对同一作品的多方面感受与认识	817
附：从分歧走向融通的一个典型案例	820
第一节 宋元明三代对《锦瑟》的阐释	820

第二节	清人对《锦瑟》的阐释	824
第三节	20 世纪学者对《锦瑟》的阐释	833
第五章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李商隐现象	839
第一节	钟摆现象	839
第二节	纷歧现象	843
第三节	索隐现象	845
第六章	一部国内失传多年的李商隐诗选评本	850
主要参考文献及引用书目		862
增订再版后记		869

第一章 晚唐前期的政坛与诗坛

按照通行的唐诗分期，一般将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到唐哀帝天祐三年（906）这八十年间的诗歌划为晚唐时期^①。但如细加分析，则这八十年间，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诗歌发展状况，都还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有明显区别的阶段。前一阶段从文宗大和初到宣宗大中末（827~859），共三十三年；后一阶段从懿宗咸通元年（860）至唐亡（906），共四十七年。李商隐的政治与文学创作活动，正好在晚唐前期这三十多年。关于文、武、宣三朝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上编各章中结合商隐生平与各个时期的创作已分别作了具体叙述，这一章结合对晚唐前期诗坛的鸟瞰，对这一阶段的社会政治状况作一总的叙述。

第一节 文武宣三朝政坛

李商隐的幼年时期是在“元和中兴”的局面下度过的，这对商隐的政治追求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这个“中兴”局面并没有稳固的经济、政治基础，唐王朝的各种矛盾不但没有消除，有的矛盾（像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还有了新的发展。唐宪宗本人在取得政治、军事方面一些胜利和成绩后就崇佛媚道，吃长生药，更加宠信宦官，使宦官势力

^① 晚唐时期的时间上限，文学史家还有一些小的差异，如有的主张起自宝历初（825）。此不烦述。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部分即起自文宗大和元年。

进一步扩张，最后被宦官所杀，开了唐后期宦官擅自废立、杀害皇帝的先例。范文澜将宪宗死的那一年（元和十五年，820）作为唐后期开始的标志，从历史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唐宪宗死后的第二年（穆宗长庆元年，821），因科场请托案引发的元稹、李绅与李宗闵间的斗争，就与日后的牛李党争有人事上的联系^①。穆宗、敬宗二朝，裴度与李逢吉之党斗争相当激烈。藩镇割据方面，长庆二年，河朔三镇又重新恢复割据局面，短暂的全国统一随之结束。从此，唐王朝转入以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为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后期。

穆、敬二宗荒淫。在他们统治的六年中，唐王朝一度出现的“中兴”局面转瞬即逝。穆宗好击鞠，狎俳優，喜游畋，赏赐嬖幸无度，财政困难重重，河北之师不得不罢。敬宗亦好击球，惑佛老，好土木，兴作相继，群臣争以进奉希宠。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是针对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杜牧《上知己文章启》）而发的。后来敬宗即因“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被宦官杀死，年方十八岁。

继穆、敬二宗之后的文、武、宣三朝皇帝，尽管其业绩不同，且各有缺失，但平心而论，都还不是荒淫昏聩之君，而是力图挽回颓势。但他们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未能挽回唐王朝的衰颓趋势。唐文宗是一位勤俭节约、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即位后针对穆、敬两朝的弊政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通鉴》卷二四三）。鉴于宦官势力的猖獗，他将剪除宦官势力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先后有过两次这方面的行动。一次在大和五年，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灭宦官，结果因申锡将此事密谕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谋，郑注、王守澄得知后，反而利用文宗的多疑，诬告申锡谋立漳王，使申锡贬死开州。第二次在大和九年，与李训、郑注谋诛宦官，结果酿成了“横尸流血，狼藉涂地”的甘露之变。文宗最后在“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的哀叹声中郁郁死去。这

^① 过去的史籍将此事作为晚唐牛李党争的开始。但李德裕实与这场科场案无关，详见《李德裕年谱》137~142页对此事的辨正。但当时在翰林院中，德裕与元稹、李绅关系较密，时称“三俊”，傅璇琮也认为“李宗闵等党徒因怨恨元稹，也一并嫉恨李德裕，这是可能的”。而且，以后李绅成为李德裕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故此事与后来的牛李党争仍有一定联系。

两次行动的失败，表面上看，都是因为谋事不密或所托非人造成的，但实际上，剪除根深蒂固的宦官势力，绝不是靠某一两个亲信、搞一两次突然袭击式的行动就能成功的。因为宦官势力植根于中唐以来腐朽的政治土壤，又长期掌握着禁军大权，绝非靠偶发的一两次行动所能剪除。更何况文宗依靠的是郑注、李训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投机家，文宗的暗于知人和寡断多疑正是造成其勤俭而不能图治，反而使局势变得更糟的主观原因。

继文宗而立的武宗，在唐后期是比较英武有为的皇帝，不像文宗那样软弱多疑，暗于知人。他专任唐后期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为相，在位六年期间，击退回鹾的侵扰，平定泽潞镇刘稹的反叛，打击佛教僧侣势力，抑制宦官势力，裁减冗吏，并着手准备恢复被吐蕃长期占领的河湟地区，应该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是有成绩的。但武宗在取得一些胜利和成绩后也重蹈宪宗晚年的覆辙，崇道教，好神仙，喜畋猎，最后终因服食金丹而丧命。由于在位时间短，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恢复河湟的事业。而武宗在位、李德裕执政期间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很快便被继位的宣宗否定掉了。

宣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大中前期）的政纲，就是“务反会昌之政”。他是敬、文、武三位皇帝的叔叔，为了表明他是直承宪宗大统的，故在用人施政上处处与会昌之政唱反调。会昌年间打击佛教僧侣势力，大中之政却重新修复废寺、兴建新寺，以致“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会昌年间毁佛像铸钱，以改变钱轻物重的局面，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重新恢复钱轻物重的积弊。会昌年间击退回鹾侵扰，是正当的防卫战争，大中年间却加以否定，说“会昌中奸臣当轴，遽加殄灭”。会昌时裁减冗吏，大中时却增复会昌所减州县官。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即位以后即重用牛党新进，不遗余力地打击陷害会昌年间政治、军事上有建树的李德裕政治集团。李德裕从首相的位置屡遭贬降，直到最后死于崖州；德裕的两个主要助手李回、郑亚也由宰相、给事中外贬，最后分别死于江州、循州贬所。这种不问是非曲直，一概反对前朝之政的做法，原因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宣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标榜自己直承宪宗大统以外，还因为武宗在位、李德裕执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如取消宦官监军之权，让最有势力的宦官头子仇士良退休，任命

崔铉为相时不与宦官头子商议等)，宦官对抑制自己势力的李德裕不满，更担心皇帝、宰相的有为与明断，因此想立一个他们能随意支配的皇帝。正好宣宗年轻时韬晦装痴，又受到过文宗、武宗的轻侮，对文宗、武宗素来不满，于是宦官就利用宣宗的“痴”和对文宗、武宗的不满立他为帝，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地位。而宣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但要顺从宦官的意志，反对会昌之政，而且要依靠和李德裕对立的牛党后进白敏中、令狐绹等人来主持朝政。因此，大中时期“务反会昌之政”，正是宣宗、宦官、牛党三股反对武宗、李德裕的势力为各自的利益纠合在一起，互相利用必然出现的结果。恰恰唐宣宗又是一个“以察察为明”的皇帝，宰相白敏中、令狐绹等，又是政治才能平庸、对上庸懦、对政敌阴狠之辈，因此尽管大中前期的政局因叨会昌的余威，还相对平静（其间，大中三年原为吐蕃所占的三州七关及维州内附，大中五年张义潮率瓜、伊十一州归唐，还呈现出一片升平气象），但到了后期，就露出了一些分崩离析的迹象。标志之一是各地方镇的部将驱逐、杀害主帅的事件不断发生，且作乱地区已转移到一向相对平静的南方。如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大中十一年五月，容州军乱，逐经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到七月，岭南、湖南、江西、宣州不断发生军乱。说明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削弱。标志之二是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如大中五年蓬、果二州百姓据鸡山聚众反抗，六年湖南邓裴聚众起义。到了大中十三年，即商隐死后一年，终于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唐王朝从此进入灭亡前的风雨飘摇阶段。《新唐书·逆臣传赞》：“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太宗之遗德余泽去民也久矣。而贤臣（按：指李德裕）斥死，庸懦（按：指白敏中、令狐绹辈）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这说明大中朝的政治已经发展到走向乱亡的临界点。

从上面这个粗线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文、武、宣三朝这三十多年，是唐王朝在各种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宦官与朝官、皇权的矛盾，藩镇与中央的矛盾，朝官内部的党争）的发展深化中，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力量，逐步走向矛盾大爆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已经失去

了政治革新的勇气与力量。尽管力图挽回颓势，在某一短时期内也曾出现过一些振兴气象，但终于无法挽回颓势。人们常用李商隐《乐游原》五绝中的诗句“夕限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他所处的时代，或者借用许浑《咸阳城东楼》中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当时的时代氛围，应该说都是十分形象而贴切的。如果说前者显示了唐王朝无可挽回的没落趋势，那么后者则预示了一场大风暴的即将来临。

上面所描述的是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总的发展趋势。但在这个总趋势中还是有曲折起伏，历史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式的上升或下降。其间不仅有武宗会昌年间因击退回鹘、平定泽潞而导致的朝廷声威暂时复振，而且有大中三年三州七关收复后呈现的一片表面升平气象。一千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唐王朝最后覆灭的历史结局早已成为常识的时候，再回过头去看那一段历史，当然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的唐王朝已经形成必然覆灭的趋势，但当时生活在那个现实中的人们，却未必对这种发展趋势有深切的感受与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那些对唐王朝怀着深厚眷恋感情、不愿看到它覆亡的人们更往往因感情的因素而影响理智的判断。严格地说，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尽管唐王朝衰亡之势已经形成，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尚未酝酿成熟（王仙芝、黄巢起义在商隐死后十六年，即公元874年方才爆发）；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集团派别间的矛盾斗争尽管空前尖锐复杂，但还没有达到彻底分裂的程度；上层统治集团尽管日趋腐朽，但还有一定的统治力量。直到李商隐去世前几年，全国还大体上保持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暂时的表面平静。要在这样一种虽趋衰颓却还保持表面相对平静的时代，对时代趋势具有清醒的认识，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超前敏感。这种敏感往往为关注政治而又天才善感的诗人所具有。在对时代没落趋势的敏感方面，杜牧、李商隐在当时诗人中都是很突出的，而商隐的政治敏感有时甚至超过了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杜牧《上李中丞书》）的杜牧。大中三年十二月四州七关收复后，杜牧写了一首《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诗云：“行看腊破好年光，万寿南山对未央。黠戛可汗修职贡，文思天子复河湟。应须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诗歌盛

业，一篇《江汉》美宣王。”俨然以周宣王中兴比拟宣宗收复四州七关的“盛业”，反映出杜牧对当时局势未免过于乐观的感受。而李商隐则是较早地就敏锐地感受到唐王朝衰颓趋势和荆棘铜驼命运的诗人，他的《曲江》、《咏史》（历览前贤）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便是有力的证明。对唐王朝的全面危机和荆棘铜驼命运，他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有更深切的感受与认识。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宏观上来考察历史，那么从安史之乱以来的整个唐代中后期（包括李商隐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逐步过渡的时期。均田制的破坏、庄园经济的发展、租庸调法的废弛与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个转折过渡时期带来政治、思想、文化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因此，唐代中后期种种社会矛盾，不仅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种标志。正如我们考察《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不应只着眼于清王朝的康、雍、乾这样一个特定阶段，而应从宏观着眼，把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放到整个封建社会行将衰朽没落的总行程、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尽管生活在李商隐或曹雪芹时代的人们，包括李商隐、曹雪芹自己，都不可能从理性上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实质，但天才而敏感的诗人、作家却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时代氛围和气息，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总之，如果我们从唐代中后期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行程的结合上来考察这个时代，就会发现李商隐不仅处在唐王朝的衰颓期，而且处在封建社会越过繁荣昌盛的顶峰逐步向后期转变的关节点。这样，我们对李商隐其世、其人、其心、其诗都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对李商隐诗中笼罩着的那一层浓重的悲凉之雾，那种浓重的感伤情调，也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管世铭说：“李义山《乐游原》诗，消息甚大，为绝句中所未有。”（《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的确，“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类诗中透露的时代消息，是很大、很深远的。

第二节 晚唐前期诗坛的三大诗人群体

文、武、宣三朝三十年的诗坛上，活跃着三大诗人群体。他们分别是：以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的前辈诗人和老一辈达官显宦组成的诗人群体；以姚合、贾岛为中心的寒士诗人群体；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晚唐前期主流诗人群体。通过对这三个诗人群体情况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李商隐在整个晚唐前期诗坛上的地位和他在创作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先看第一个诗人群体。这一群体中两位核心人物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后期诗坛上的主帅和巨擘。两人同生于大历七年（772），又都活到高龄（刘禹锡活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活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精湛纯熟的诗艺和晚年优裕悠闲的生活，使他们把友朋宾主之间的诗酒唱和作为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白居易从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始，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前后达十八年之久。刘禹锡大和元年授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后虽历任朝官和苏、汝、同州刺史，但与白居易一直诗歌唱酬。刘禹锡至开成元年秋，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以后也基本上居住洛阳。两人早年都是热心政治的人物，刘禹锡更是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但到文宗朝，他们都已失去了往日的从政热情和战斗精神，诗歌对于他们已不再是“歌生民病”、讽切时政的手段，而是吟咏情性、知足保和的工具，白居易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典型。大和八年，他在《序洛诗》中自叙大和三年以来的生活与创作内容时写道：

《序洛诗》，乐天自叙在洛之乐也。予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遭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歿别离……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计八九焉……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此一乐也。大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洛，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

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足身闲，文之以觴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

这篇《序洛诗》不仅相当集中地表现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思想和诗歌创作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这一诗人群体共同的思想创作倾向。白居易并非不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什么“理世”，而是衰世。但由于自己直言被贬的坎坷经历，特别是自元和末年以来，国事朝政日非，南北司之间、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日剧，使他深感仕途的险恶，因而早年即已存在的知足保和、独善其身思想这时终于占了主导地位，成为他晚年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在开始过这种诗酒宴乐的闲适生活时，未尝没有心理矛盾，也有借此远离纷争不已的政局、洁身自好、不与污浊政治现实同流合污的意愿。但这种闲适安乐的生活过久了，自然形成了一种惯性，真的以闲适为乐了。《序洛诗》与《新乐府序》、《与元九书》所阐述的诗歌主张，判若出于两人。从《新乐府·采诗官》“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到《序洛诗》让采诗者“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清楚地显示了从元和到大和白氏诗风的转变。白居易前后期的转变，其个人经历、思想的变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从根本上看，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兴理想的破灭造成的。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并称“刘白”，白居易自己也说“四海齐名白与刘”。他晚年的诗虽不像白居易那样一味鼓吹知足保和，吟咏闲适安乐，而是时露人生感慨，时寓人生哲理，有时还微寓讽慨与不平。但从整体上看，他晚年的诗离政治现实比起过去显然是远多了。在白、刘二人中，刘禹锡的联系面更广，除白居易外，与令狐楚、裴度、李德裕、元稹、李逢吉、牛僧孺、卢贞、姚合等都有交往，涉及不

同政治派别的重要成员，而白居易集中，却未见有与李德裕的交往唱酬。在这一诗人群体中，白、刘二人是核心，关系特别密切者，是令狐楚，此外则为裴度。白与元稹是多年知交，但元稹大和五年即已去世，在大和元年至五年这段时间里，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坛上的活动与斗争。总的来说，这一诗人群体的共同创作倾向是对政治采取逃避或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的诗主要内容是宴饯唱酬，可以说是诗歌史上一批在衰颓时世中显达之士的闲适宴乐诗。这样一种创作倾向，不仅与传统的儒家诗教、美刺比兴传统明显不合，也和“发愤抒情”的诗歌主张不合，更和自中唐以来的“苦吟”诗风不同。他们的诗歌创作，除了自得其乐、相互酬赠以作闲适生活的点缀外，在诗坛上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正面影响。他们的创作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会昌年间，但他们创作的生命力到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有成就与影响的讽谕诗、《长恨歌》、《琵琶行》和“元和体”诗^①，都已在大和之前结束，成为遥远的过去。刘禹锡诗歌创作中最有特色的怀古诗和民歌诗风的《竹枝词》等也已成为“前朝曲”。他们是上一时期诗坛的巨擘，此时却已成为诗坛的“遗老”。他们的诗这时已很少涉及政治。大和二年刘蕡对策被黜及会昌初被冤贬，宋申锡谋诛宦官失败被贬死，甘露之变，开成三年太子李永被废及暴死，会昌年间击回鹘、平泽潞等一系列震动朝野上下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在刘、白等人的诗中竟寂无反响或无积极反响。甘露之变发生后，白居易写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内容不是痛愤宦官肆行杀戮，而是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宣扬全身远祸的人生哲学：“大都早退似先知”、“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又有《咏史》云：“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这与李商隐乃至许浑等新生代诗人对此事的关注和痛愤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诗心已经退出了现实政治这个古代诗人最关切的领域。

再看第二个诗人群体。这一群体可称之为寒士诗人群体，其核心人物

^① “元和体”有多重含义。元、白之元和体诗，陈寅恪据元稹自述，认为“可分为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类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见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336~337页。